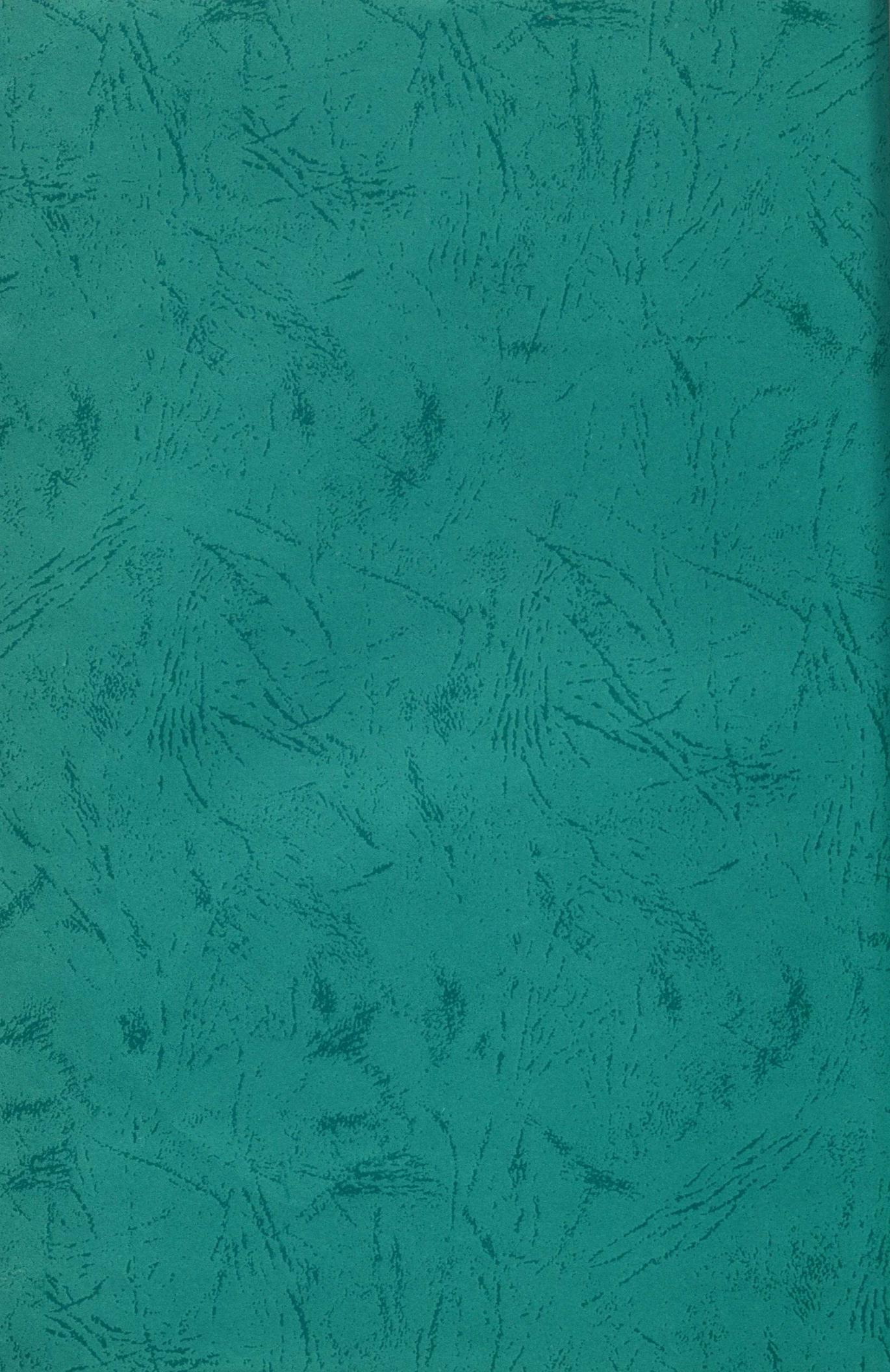


# 赛珍珠研究资料

2001年

宿州师专图书馆







# 目 录

|  |     |
|--|-----|
| 1、赛珍珠中国小说研究给我们的启示<br>——《中国早期小说源流》读后    | 姚君伟 |
| 2、论赛珍珠的宗教观                             | 徐清  |
| 3、《大地》中赛珍珠的宗教立场                        | 顾钧  |
| 4、近年中国赛珍珠研究回眸                          | 姚君伟 |
| 5、赛珍珠小说《大地》的内在价值                       | 顾汉燕 |
| 6、论赛珍珠笔下的王虎                            | 杜林  |
| 7、析《东风·西风》的陌生化表现手法                     | 周卫京 |
| 8、女性的沉默与抗争<br>——评赛珍珠的《大地》与《母亲》         | 芮渝  |
| 9、试论赛珍珠的中国农村题材小说                       | 沈艳枝 |
| 10、传统与现代的交锋<br>——读赛珍珠的《东风·西风》          | 周卫京 |
| 11、她建起了沟通中西方文化的第一座桥梁<br>——再谈赛珍珠《大地》的启示 | 冷满冰 |
| 12、赛珍珠创作中的美国因素                         | 顾钧  |
| 13、赛珍珠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资料小识                   | 刘海平 |
| 14、《群芳亭》：从小说到电影                        | 姚君伟 |

## 【赛珍珠专题研究】

# 赛珍珠中国小说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早期小说源流》读后

姚君伟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迄今为止, 我们对赛珍珠非小说作品的研究仍须加强和深入。赛珍珠的中国小说研究是其非小说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中, 赛珍珠从历史入手, 追根溯源, 客观地研究中国小说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过程, 使自己的研究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层面; 她采用比较的方法, 将研究对象置于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中, 公正地品评其得失; 同时, 她的研究也体现出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和良好的跨文化素质。凡此种种, 对于人们从事跨文化研究均有很深的启示。

**关键词:** 赛珍珠; 中国小说研究; 启示

**中图分类号:** I207.4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03X(2001)02-0012-06

在去年江苏省外国文学年会上, 我曾经指出, 在20世纪最后十年十分有利的学术环境中, 中国学者已经将赛珍珠研究推向深入,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我们有了250万字的《赛珍珠作品选集》, 有了两部赛珍珠论集, 两家高校学报开设了专栏, 定期推出有关研究成果; 更为可喜的是, 国内高校教师中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赛珍珠研究队伍, 其中有文学博士和硕士的加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赛珍珠研究势头很旺。但是, 我也指出, 我们的研究中仍旧有许多不足之处。对像赛珍珠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作家的研究, 我们希望听到些不同的声音, 而不是一边倒的异口同声, 我们呼唤拓展新的研究层面, 以取得更为具体客观的研究成果。

相对而言, 我们目前的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对作为小说家尤其是写出了《大地》三部曲的小说家的赛珍珠的研究。出现这一倾向(或者说侧重点)是可以理解的, 但需要调整。可以理解, 是因为赛珍珠首先是一位小说家, 她主要正是由于创作了《大地》这部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 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需要调整, 是因为她一生也写下了大量的非小说作品, 并

收稿日期: 2001-01-02

作者简介: 姚君伟(1962-), 男, 江苏武进人,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在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至今读来仍极有价值的观点。因此，21世纪中国的赛珍珠研究，迫切需要将赛珍珠的小说和非小说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以期得出更加全面的结论（假如要作出结论的话）。<sup>①</sup>

赛珍珠所作的中国小说研究属于其非小说作品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这方面，国内学者已作了初步的努力，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sup>②</sup>本文主要结合《中国早期小说之源流》（“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Novel”），就赛珍珠早年所作的中国小说研究给我们留下的几点启示作一些初步的讨论。

据我们所知，赛珍珠在中国小说研究方面发表过多篇论述，<sup>③</sup>《中国早期小说源流》即其一。<sup>[1] (P.40)</sup>但是，中外学界对这篇文章的注意和讨论似乎不够充分。最早为赛珍珠作传的保罗·A·多伊尔（Paul A. Doyle）在书中提到《东方、西方及其小说》和《中国早期小说源流》，认为这两篇演讲“不够成熟”（formative）<sup>[2] (P.84)</sup>，最新一部赛珍珠传记的作者彼得·康（Peter Conn）在书中提及《东方、西方及其小说》并略作分析，但未及《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不免让人感到遗憾。须知，这是作者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实地考察，而后才写成的一部大型传记，全书468页（英文版）。中外学者研究赛珍珠所进行的中国小说研究，依据的大都是她1938年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授奖仪式上的演讲《中国小说》。《中国小说》的演讲由于特殊的场合当然显得十分重要，而且，这又是赛珍珠研读中国小说的一个总结，代表了她这方面的全部认识。但是，赛珍珠的中国小说研读成果的发表并非始于《中国小说》。事实上，赛珍珠最早发表的中国小说论是《小说反映的中国》（“China in the Mirror of Her Fiction”，1930）。第二年，她又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发表《中国早期小说》（“The Early Chinese Novel”）一文。这里要论及的《中国早期小说源流》就是《中国早期小说》的修改稿。和她的《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一样，这也是赛珍珠1932年在华北语言学校所作的演讲，后两者合为一册刊布发行。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小说源流》实际上是赛珍珠所作的第二篇中国小说论，值得珍视。

赛珍珠在这篇论文中，追根溯源，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小说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过程。赛珍珠从史入手，很有见地，给人以极大的启示。这篇文章的初稿发表在西方文学（评论）界的著名刊物上，面对的主要也是西方读者，赛珍珠是希望对他们做一些中国小说的启蒙工作，让他们对中国小说先有一个史的了解。我们知道，也正如赛珍珠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的那样，中国小说素来地位低下。小说不过是“丛残小语”，“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道听途说的东西，似乎无甚可观。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文以载道”、“艺以载道”的正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孔子斥“小说”为“小道”，所以君子不为。众所周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占据了中国传统的核心位置。孔子一言既出，九鼎之重。小说家在《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中排列末位，与“通万方之略”毫不相干。小说的地位如此低下，不

<sup>①</sup>1991年元月，钱俊如先生在全国首届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上指出，研究赛珍珠要注意做到两个结合和两个分开，第一个结合就是小说和非小说结合。这个发言后收入《赛珍珠研究》“专家学者发言集粹”。我在一篇书评中，分析过这组发言的方法论意义，参见拙文《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评〈赛珍珠研究〉》（刊《河南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sup>②</sup>参见熊玉鹏《赛珍珠与中国小说——读〈大地上的房子〉》（刊《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5期），以及拙文《论中国小说对赛珍珠小说观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刊《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赛珍珠与中英小说比较研究——评〈东方、西方及其小说〉》（刊《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sup>③</sup>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赛珍珠的许多非小说作品（包括其中国小说研究）最初的形式是演讲稿，演讲后才发表的。

上台面，小说家无奈之下只得隐姓埋名，看小说、写小说成为不可告人的“勾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根本谈不上对中国小说作什么研究。

有感于此，鲁迅先生才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中写道：“中国之小说向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sup>[3]</sup>在鲁迅先生的小说史问世之前，外国倒是有几种中国文学史，如日本学者古城贞吉撰写的《中国文学史》（1897），<sup>[4](P.160)</sup>英国学者翟理斯（H. A. Giles, 1845 - 1934）所著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1）<sup>①</sup>和德国学者葛鲁贝（W. Grube）完成的《中国文学史》（1902）。<sup>[3]</sup>由于这些著作均非专门的小说史，所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大多流于零碎、不系统，如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计八卷，仅在最后三卷提及小说。而国内早期的文学史（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对中国小说采取或排斥的态度，或一带而过的做法。<sup>[5](P.3)</sup>难怪乎有学者下结论说：“当时对小说的研究一般地说是零碎的、不系统的，至于说到中国小说史研究这个领域，则可以说仍是一片荒芜。”<sup>[5](P.3)</sup>直到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中国才有了第一部小说史专著。

由于西方学者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小说论述过少，20世纪初期中国又无专门的小说史，不难理解，西方读者对中国小说所知甚少，对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了解就更是少得可怜。赛珍珠在《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中指出：“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小说几乎还是一无所知。文学史里包括的是中国诗词和名人语录，就连著名的汉学家在涉及小说和故事的问题时，也仅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sup>②</sup>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从小就喜欢看中国小说并长期浸淫其中的赛珍珠就凭借其特殊的双语文化优势，大力宣传中国小说。

可贵的是，赛珍珠并非就中国小说作些零碎的介绍，她知道那样，西方读者恐怕仍旧无法建立起对中国小说的完整概念和印象，而只有有了史的了解，也即了解中国小说的历史性，西方读者才可能认识到，中国早期小说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壤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小说的内容和艺术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历史上种种文化因素、文化传统的制约。赛珍珠通过向西方读者展示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向他们提供中国小说的传统以及形成这一小说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知识，从而了解中国早期小说的特殊的局限性并领略其独到的艺术魅力。脱离中国文化历史语境，便难以真正了解中国小说，如中国小说起步早发展缓慢的原因，中国小说真正的演义性，中国小说作家的匿名问题，<sup>③</sup>等等。概括地说，赛珍珠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小说源流的探究，向西方读者展示一个内容十分丰富却长期为西方所忽略的小说传统。她认识到，只有从源流入手，将中国小说置于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才能见出中国小说的特征和价值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说服西方人认同中国小说虽不同于西方小说却一样有价值的观点。

赛珍珠与中国小说有缘。<sup>[6](P.27)</sup>她读过的中国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封神演义》、《野叟曝言》、《镜花缘》、《金瓶梅》，等等。她读的中国小说之多使一般的“中国通”大为逊色，同时，也让中国人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

① 这是第一部英文本中国文学史。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Lai Ming著，林语堂作序的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由 The John Day Company 出版，而这是赛珍珠的丈夫理查德·沃尔什主持的出版社，本书得以出版，其中是否有赛珍珠的撮合呢？

② 引自本期刊出的赛珍珠《中国早期小说源流》（张丹丽译），以下不再另注。

③ 迄今为止，这些仍是中国小说研究者所探讨的问题。前不久，还读到一篇文章：《〈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张志和），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8日第5版。

1938年，她在以《中国小说》为题的演讲中，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她叙述了中国小说的发生、发展，重点分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作品，抽绎出中国小说的基本特征，并就中国小说对人物的要求、对动作的描写和语言功能等均作了细致的阐述，指出了中国小说的民间性和通俗性等艺术特色。赛珍珠的这些认识，大多已经在《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中得到了初步的表述。说赛珍珠熟悉中国小说，并非夸大其辞。

不过，除中国小说，赛珍珠也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小说。她对狄更斯的作品就有偏爱，对于其他许多英美作家的作品也多有涉猎，如德莱塞、刘易斯、奥尼尔、马克·吐温、海明威、班扬，她还读过意识流小说代表作法国作家普劳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由于赛珍珠从小开始就同时在阅读中外小说，在她的阅读过程中，比较是难免的。有学者讲过：“一个中国人学习外国文化，必然在同时进行中外文化比较。即便写的是外国，写的角度却仍然是中国的，比较已经寓于其中。当两种文化像中国和美国这样迥然不同时，鲜明的反差就格外发人深省。”<sup>[7](P.1)</sup>按照这一思路，我们也不妨说，在赛珍珠的中国小说阅读和后来的研究中，比较的思维也已寓于其中。与《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不同，<sup>①</sup>《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主要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中国早期小说的源流，分析各时代中国小说所具有的特征，但是，其间仍或隐或显地包括了比较：比较的思路、比较的方法。在文章中，她比较了中西不同的小说观，指出了中西小说不同的发展历程，也指出了中西小说对艺术技巧方面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当然，赛珍珠在比较的同时，也作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她追溯中国小说的源流，其出发点也就是要为中国小说声辩。在她看来，中国小说有其精华，这些精华部分向西方读者展现出了一个新的天地，而且，在写作上，由于中国早期小说有其自然性和民间性特征，因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坦率地表达对生活的认识，其忠于生活的程度是西方小说所不及的，因为西方小说在赛珍珠看来过多地考虑艺术技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和在《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中一样，赛珍珠在《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中，再次为中国小说结构辩论。她提出，对于西方评论界，在中国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人物众多，出现了一会儿，就从接下来的几章中消失，一直到小说结尾处才又于不经意处露面，或者干脆不再露面，有关线索就断在那里。结果，小说变得拖沓冗长，毫不协调，有时是一片混乱。”赛珍珠反驳说，这一结构能使人产生联想，让人加深对生活的思考。她说：

生活中并没有仔细安排和组织好的情节，人们生生死死，根本不知道故事有什么样的结局，又为何有这样的结局；人们登上生活的舞台，又走了下去，没有解释，上场与退场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也许以后会被人说起，也许不会。因为中国小说缺乏连贯性，也许就是一种技巧。这种技巧如果不是精心考虑的，无意中却也是对生活本身的不连贯性的模仿。

赛珍珠认为，从中国早期小说中，人们能够看到一幅反映伟大而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小说在西方评论家眼中的什么优缺点便显得微不足道了。这里不难看出，赛珍珠对中国小说的价值判断已经是进入人生哲学的层面。她的比较已经不是浮于表面，而是深入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内层。

在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素质方面，《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也给人以启示。赛珍珠之所以成为“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生卓有成效地沟通中西文化，与她童年的经历

<sup>①</sup> 赛珍珠在《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中，从发展途径、结构与形式、意义和目的等方面，就中英小说之异作了跨文化比较研究。

和成人后的阅历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她从小置身于中国世界，但她又属于美国传教士父母的美国世界，她从小就不忘与人交流、沟通，她才是真正生活在中国人中间，而非像当时在华白人那样，将自己局限在本族人的狭窄圈子里，人到了中国，实际上仍生活在美国，根本没有融入中国人的生活。赛珍珠自小接受的是双重语言、双重文化教育。她的家庭教师孔先生作为儒家文人，向她灌输的是儒家文化观念。中国文化教育让她认识到应该把地球上的各个民族视为一个大家庭里的不同成员。赛珍珠接受的可谓是差异教育，少女时代的教育使她认识到差异的必然和必要。她不像一般意义上的旅游者那样，每到一处，总以自己原先的标准要求他们所看到的一切，而实际上，旅游的乐趣当在于发现——发现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丰富自己。赛珍珠的这一文化观念也帮助她能以客观的态度而非西方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小说。同时，赛珍珠的双语能力也是一大优势。她是先学会中文，后学会英语。她背着孔先生看了许多中国小说，孔先生又辅导她读了许多儒家经典。她日后翻译《水浒传》，等等，属于水到渠成的事情。她在《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中说：“一旦扫除了语言障碍，中国小说就能向西方读者展示出一个迷人的新天地。”可见，真要了解和欣赏另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首先的一步就是要掌握语言。但是，中文容易掌握吗？而不掌握语言，碰到像中国文化这一迥异于西方文化的对象，又怎样去了解它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难道能通过翻译真正地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内质吗？

彼德·康在《赛珍珠文化传记》的一条注释里谈到赛珍珠在半个多世纪前所作的演讲中讨论并赞赏的中国小说今天很可能同样不为人所知，“多元文化课程尚无空间留给中国小说杰作”<sup>[8](P.419)</sup>。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也谈到，“有相当多的西方比较文学教授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一无所知，连鲁迅先生的名字都未听说过，更有甚者，他们对此并不感到可耻，反倒感到完全正常”<sup>[9](P.196)</sup>。这里除了有不正常的文化心态以外，肯定也有语言障碍的问题。这样的比较文学家无法进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而只能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西方文学范围。然后，往往正是有着这样素质的学者自以为自己局限性很强的研究成果具有世界有效性。这是可悲的。国际级的比较文学家对中国文学尚且如此无知，何况普通人呢？

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挣脱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枷锁，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纳入大家的研究视野，这样才符合比较文学的精神，比较文学也才有生机。在这一层面，赛珍珠的中国小说研究给人以很大的启示，也发人深省。读了多年赛珍珠之后，我发现，赛珍珠的中国题材小说的意义更多的是文化上而非文学上的，同样，赛珍珠的中国小说研究意义也已经不仅仅在于研究本身，更多的是在于文化（跨文化）。她在推崇、宣传的是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中国小说。近百年来，中国总的的趋势是文化输入远远多于文化输出，而赛珍珠是在帮助中国的文化输出！而输出的成功有赖于输出者本身良好的（跨）文化素质。

## 参考文献：

- [1] 姚君伟. 赛珍珠与中英小说比较研究——评《东方、西方及其小说》[J]. 镇江师专学报, 2000, (1): 39 - 49.
- [2] Paul A. Doyle. Pearl S. Buck [M]. New York: Twyne Publishers, a division of G. K. Hall and Company, 1980.
- [3]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序言 [A]. 中国小说史略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4] 程章灿. 五种英文本中国文学史著作评述——兼谈中国文学史的编撰问题 [A]. 跨文化对话: 第2辑 [C].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9.149 - 164.
- [5]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6] 姚君伟、张丹丽. 赛珍珠与中国小说之缘 [J]. 世界文化, 1995, (2): 27 - 28.
- [7] 钱满素. 爱默生和中国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8] Peter Conn.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 [M].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9] 王宁. 全球化、本土化和汉学的重建 [J]. 东方丛刊, 1991, (1): 183 - 197.

## Enlightenment of Pearl Buck'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Novel ——On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Novel"

YAO Jun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So far, Chinese Scholars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earl Buck's studies, but we are still lacking in studies of her nonfiction (including her studies of the Chinese novel). In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Novel", Pearl Buck traces back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ovel throug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demonstrates a healthy cultural mentality and good crosscultural quality. All these are enlightening to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Pearl Buck; studies of the Chinese novel; enlightenment

## 《全宋诗》拾零

吴宗海

重出

册三四卷一九三五页 21595 毛国英《诗一首》：“铁锁沉沉截碧江，风旗猎猎驻危樯。禹门纵使高千丈，放过蛟龙也不妨。”（宋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上）与册二二卷一二八八页 14622 毛伯英诗（清吕愚先同治《奉新县志》卷九）全同。

按：《娱书堂诗话》早于《奉新县志》，当从之，删去毛伯英诗。

册三三卷一八六九页 20902—20904 何麟集《外祖父丞相初登科为维县主簿经摄垍镇税官留诗护国寺中令狐监征录以见寄再拜追和而记其后》：“传翁遗墨剩咨嗟，四海当年尚一家。大老不为今日用，小诗徒遣后人夸。兴来思跨逐滇马，归去方乘下泽车。燕麦兔葵僧舍里，何如梦得访桃花。”（宋程遇孙《成都文类》卷五）《虎丘》：“平地涌岩壑，稜层惊大雄，何曾远人世，直欲傍天宫。白虎威灵在，赤乌缘影空。生公能说法，音与塔铃同。”（宋郑虎臣《吴郡文粹》卷四）句：“一楠枯再生，两石合无罅。”（云顶山《舆地纪胜》卷一六四《澧州府路·怀安军》）“梁山韭黄妙天下，玉筋金钗盈大地。”（同上书卷一七九《夔州路·梁山军》）与册三四卷一九四六页 21759—21760 何麟诗、句相同。按：何麟、何麟当为一人，即何麟。房日晰先生在《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已作考证。

## 【赛珍珠专题研究】

## 论 赛 珍 珠 的 宗 教 观

徐 清

(南开大学 中文系, 天津 300071)

**摘要:**多元的宗教价值观在赛珍珠的思想观念体系中并存,在作品中,她描述了不同宗教相互碰撞与冲突的情形,主张通过“爱”与“人道”进行沟通,倡导宗教宽容。探析其宗教观是打开赛珍珠心灵之锁的钥匙,并能清晰地映照出她为跨文化沟通提供的启示。

**关键词:**赛珍珠;宗教观;宗教宽容;跨文化沟通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3X(2001)01-0018-06

作为传教士的女儿和妻子,本人又曾具有传教士身份,赛珍珠与基督教的关系密不可分。基督教文化是她孩提时代树立价值观的源泉,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必然溶化在她的血液里。作为在双重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人,她自幼又浸淫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一边跟随家庭教师孔先生习儒教经典,从古典文学研读中领受中国古代至圣先师的思想和渗透释道精神的美感,一边聆听着保姆王阿妈的佛教故事、道教传说,又在下层民众生活中亲身感受到了民间宗教的绵延不绝。多元的宗教价值观在赛珍珠的思想观念体系中并存,这使她对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态度。她认为佛教与基督教有相通之处,把孔子比作在天的上帝,把圣母玛丽亚看作观音菩萨的妹妹;她从不惮于揭露福音派的荒唐、迷信、文化上的无知和行动上的残酷,与长老会教会针锋相对,终至决裂。从某种角度讲,探析赛珍珠的宗教观是打开其心灵之锁的钥匙,从宗教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上能够更加清晰地映照出赛珍珠为跨文化沟通提供的启示。

宗教心理学表明,家庭和父母的宗教态度和行为对于树立个人的宗教信念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赛珍珠成长经历中的第一块精神园地便是父母的美国人长老会世界,长老会代表着基督教最保守的教派之一。父亲是典型的原教旨主义者,虔诚地遵循着原教旨主义的神学主旨,即毫不妥协地维护《圣经》启示的绝对神圣性与权威性。母亲苛守一个传教士妻子的职责,终生盼望着上帝能够显灵。赛珍珠深味父亲的信仰带给家庭的无尽苦难和母亲日甚一日的幻灭感,内心埋下了一颗反抗的种子。尽管如此,在与布克订婚后不久,赛珍珠仍向长老会海外传教协会申请一个传教士妻子的任命。这说明,25年的宗教训练使她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信仰,与日俱增的内心怀疑也无法将其迅速打破。另外,赛珍珠对父母尤其是母

收稿日期:2000-09-21

作者简介:徐清(1972-),女,山东淄博人,南开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

亲的忠诚，也要求她继续尊重这种信仰，因为他们靠它过了一生。

赛珍珠的早期作品《东风·西风》中弥漫着教中国人如何生活的传教士口吻。她的中篇小说《天使》则塑造了一个被中国人的恶习气得自杀的女传教士形象。小说把中国民众的恶习比作滔滔长江水无法遏止，把与之作斗争比喻成一场恶战，这并非只是巴莉面对中国更夫的感受，而且也是赛珍珠心灵世界的真实写照。巴莉在留给姐姐的信中说，她要设法对于这些她为他们度去一生的人们在心中表示一种爱感，但恐怕他们懒惰成性，无可挽救；也许，他们的身体虽然不洗，脑筋和手虽然不用，但是他们的灵魂仍然可以得救。这些话里那种拯救异教徒的傲慢姿态清晰可辨。

赛珍珠生活在古老的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基督教一开始曾挟西方经济之势席卷半个中国，但终究不能在中国人心灵深处扎根。陈独秀于1907年在《答列经扶》中说，“宗教的价值在其对社会福祉的直接贡献”，比如是否能使人们拥有改革社会的勇气，使社会获得进步，是否能使科学得到昌明等。在当时，基督教并不能比佛教道教更应验地解决百姓的需要，实用的信仰没有得到实际回报就不会再维持。其次，基督教也不符合当时的科学观念，对于文化人来说，信仰如果触犯了理性，便不能继续恪守。胡适甚至认为卫理公会教长说教“大似我国村姑说地狱事”。这种看法极具有代表性。再次，作为西方宗教，基督教还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传教士总是持高人一等的保护者姿态，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感觉常常出现在中国人心头。尤其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天朝大国意识潜藏在民族自尊自强的口号下，成了一些人抵制基督教的一个充分理由。然而，“耶稣基督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蒋梦麟语），此言并非毫无道理。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传教工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使中国变得更像西方，西方人将技术援助作为意识形态输入的外包装，企图控制中国。他们不但不认为自己是入侵者，更不去适应中华民族的种族特点。正如胡美在1925年1月给设在纽黑文的“耶鲁中国计划”的理事会的信中所说：“如果外国学校或一个外国人不能像嫁接的枝条那样与活树的有机体融为一体，就会死去。”<sup>[1](P.176)</sup>即使在国力衰微的时候，中国人也意识到，以外国的条件接受外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屈服。

置身于这样的氛围中，赛珍珠不得不重新思考基督教进入中国及在华传教士的种种问题。她在狭窄的传教士圈子里生活，对他们的种种卑劣品性了解得十分真切，很早就与他们缺乏认同感。她总是拼命逃避，常常跑到那些通称为异教徒的、比较和善的农民和街路上的人们中去。赛珍珠在《奋斗的天使》一书中指出，父亲那样的传教士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心里空荡荡，脑中黑漆漆。”1932年11月2日，应一群长老会女教徒之约，赛珍珠在纽约的阿斯塔饭店发表长篇演说，立场鲜明地提出了海外传教活动没有必要的主张，并用“心胸狭隘、缺乏同情心、傲慢无礼、愚昧无知”来形容典型的传教士，她这样揭露福音派：“我见过教会里很有名望的正统传教士——这种措辞太糟糕——他们对本可拯救的灵魂毫不怜悯；对外族的文明一概鄙夷不屑；相互之间刻薄尖酸；在感情细腻、文质彬彬的民族面前显得粗俗愚钝。凡此种种，无不让我心羞愧得流血。”<sup>[2](P.168)</sup>1932年10月，一本断然否定传教事业的书《重新审视海外传教活动》在美国出版，引起轩然大波。书中有份长达三百页的报告，综述“非神职人员对国外传教活动的调查”，这个调查由基督教七个教派联合发起，由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霍金担任主席。报告不厌其烦地列举传教的失败，赞颂“不拘门户之见”的宗教抱负，主张“各种信仰都含有宗教真理”，这大大激怒了原教旨主义者。赛

珍珠于1932年11月在进步刊物《基督教世纪》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声援霍金。1933年5月，赛珍珠又在《世界主义者》上发表了《复活节，1933》，把基督比作菩萨，声称历史上基督是否实有其人并不重要；否认教条的必要性，认为基督教真理是“由凡人的最高理想提炼而来的”。赛珍珠的直言不讳引起了教会的愤然反应。以费城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J·格雷沙姆·梅琴为首的原教旨主义者强烈要求当众谴责赛珍珠并解除其职务。赛珍珠立即提出辞呈，教会随即免除了她的教职。

赛珍珠说：“我从来不是传教士，虽然有时我作为一个青年妇女而在教会学校和中国的国立大学中任教。……即使在精神上我也不是传教士。”<sup>[3]</sup>赛珍珠要离异的是教会和传教士，而不是基督教本身。她极为推崇基督的博爱之心，认为父母及其他许多教会人士在带给中国伤害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现代医学和教育，便是由于他们受了基督爱心的鼓舞与驱使。她笃信基督教的力量，在《大地》三部曲之《分家》中，借玛丽的父亲之口向王源解释每天饭前的祷告仪式，并说，“这仪式本身并不重要，然而它是我们生活赖以生存的最崇高事物的象征——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你还记得你说过我们的繁荣和强大吗？我相信这是我们宗教的果实。”然而，教会和传教士却有违于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个人的灵魂与上帝认同，阻碍甚至排斥探索真善美的个人直接面对《圣经》。赛珍珠很清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宗教命题的世俗意义在于：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但探索真理的自由没有；任何平等都是相对的，但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人人平等。这与她的双重文化背景所造就的思想观念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她说自己的脑海里形成了两个焦点。“我在早年就认为，在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绝对真理，有的只是人们眼中的真理，真理也许是，事实上也就是个多变的万花筒。”<sup>[4](P.51)</sup>《分家》中，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的玛丽父母善意地开导王源，带他去教堂，希望他能够信教，并且回国后现身说法。玛丽为此感到窘迫，这个熟谙中国文化、连汉代晁错的《论贵粟疏》都能背诵的美国姑娘把赛珍珠的心声表达得淋漓尽致。她坚决反对王源被基督教改造，被她父母用异国的东西强加于身。“我要进行斗争，使你不做这种信仰的俘虏，因为对你来说它们是不真实的；……你和我——我们必须有自己赖以生存和死亡的信仰！”

在宗教教育方面，赛珍珠曾这样说过：“真幸运，我同时受到基督教和儒教两种思想的影响。但这样的教育不可能使我仅仅成为一个纯基督徒或纯儒教徒。实际上我的信仰是多重的，无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儒家对我都有影响。”<sup>[5](P.257)</sup>赛珍珠很小的时候，便“从《旧约》中读到上帝是怎样的：‘因为我——你的上帝——乃是很会妒忌的，如果祖宗犯了罪，我要把灾难降在子孙的身上，直到第三代第四代——’”当她站在“山脚边的一座大寺院的阴影中，热情地望着一位安详地站在布满尘埃的壁龛中的慈祥女神的和善可亲的面孔”时，她在自己心中顽梗地说道：“我选取你——我选取你——你的样子很和善。”<sup>[6]</sup>在赛珍珠幼小的心灵中，《圣经》里的上帝过于严酷，远不如庙里供着的观音菩萨那样地大慈大悲。趋“善”避“恶”是孩子本真的追求，这也许是赛珍珠生命中的第一次抉择，尽管无意识的成分很大。赛珍珠跟随家庭教师孔先生习儒教经典，对孔子为中国社会和子孙后代创立的一整套伦理纲常表示赞同。与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要么互不相容要么互相竞争迥异的是，中国文化中儒、释、道的交融形成一种宽大的胸怀，各派宗教盘根错节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互相合作。人们常说，中国人只要愿意可以同时信奉几种宗教。一个人头戴儒冠（在国事典礼上），身着道袍（在有人得病道士光临时），足蹬僧履（举行丧礼时），这种情况不足为怪，中国传统文化的“仁者爱人”、“普渡众生”、“宁静淡泊”等人生宗旨比起基督新教与天

主教的斗争、原教旨主义与现代派教义派别之争来，无疑要文明得多，人道得多。《群芳亭》中来自意大利的安德雷神父，由于坚信男女平等，天赋人权而被视为异教徒，遭到教会驱逐，不仅不允许归家，而且被断绝了一切接济，从此，他浪迹天涯，在中国偏僻农村为自己觅得一方墓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找到归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赛珍珠母女两代人经历的缩影。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包容性特质。

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论语》中，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子夏则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赛珍珠译《水浒传》，取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1935年，她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国和西方》以同样的话作为卷首语；她的小说《牡丹》里，大卫的中国家庭教师孔诚在教堂里向犹太牧师拉比陈述各民族平等的道理时也引用了“天下一家”这句话；她的最后一篇散文《最后的倾诉》结尾再次引用了“天下一家”，并称这是孔子的永恒真理之词。

作为一位作家，“天下一家”的胸襟使得赛珍珠“并不存有为某种使命而作的感觉。”<sup>[3]</sup>《大地》出版之后，传教者的信雪片一样地飞来，只有很少一部分赞许她写了事实，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她未能用她的才能为耶稣基督谋荣耀。赛珍珠称之为自然人生的事物，如中国人对待婚姻和两性问题的态度，则被传教者视之为罪恶。在题为《忠告尚未诞生的小说家》的演说中，赛珍珠为自己的宗旨——“天地间最单纯、最无害的一种宗旨”——写小说做了义正辞严的辩护。她强调，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愿用他所具有的一点微力来为任何宗教、任何主义、任何国家、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谋荣耀。”“他不能顺从他人的见解或道听途说，也不能容忍任何主义的指挥——无论那是多么合乎基督教义，多么正当，多么道德，或多么Communist。”她忠告未来的小说家，“切弗生在一种伟大的信条的荫影之下，切弗生在原罪的重累之下，切弗生在超度的厄运之下。”<sup>[6]</sup>

赛珍珠信奉的唯一的主义是“人道”。在她看来，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应该彼此尊重，彼此融合，“爱”便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在儒教和基督教里，人道主义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都是爱人。耶稣登山训众半个世纪以前，人们就可以从《论语》里找到那条著名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不过从正面强调了这条诫律：“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新约全书·马太福音》）赛珍珠始终呼吁世人以基督和儒教的仁爱为重，用“爱”去解决宗教冲突及其他冲突。她的小说渗入了一种厚重的宗教文化意识，人性的关怀、博爱的温馨、东方文化和宗教的宽容、庄严与神秘，铸成了独特的内在意蕴。

赛珍珠完全抛弃了许多西方天主教、基督教神职人员及教徒那种唯我独尊、排斥异教的狭隘观念，她让笔下的主人公们在不同的宗教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互通有无的、互相吸取的关系。《佛像的脸》写一位使徒教会的教徒司蒂摩由于向往中国而甘心远涉重洋，来到云南大理城外一座古庙里修行，成为一名洋和尚，最后与其他佛教徒一道参加抗日战争的故事。在共同的生活与斗争中，不同教派的人们之间充满了友谊与温暖。《年轻的革命者》是赛珍珠受人之雇而创作的小说，被《纽约先驱论坛报》赞为“现代基督教寓言”。不到20岁的农民郭生，参加了国民党军队，狂热地信奉三民主义，当作自己的宗教。后来在一场毫无意义的恶战中，他的同志全部阵亡，郭生失望之余，转而投奔在战场上的基督徒医生。郭生坚信此人名叫“耶稣”，书的最后一页，郭生决定到他和这位圣徒般的医生首次见面的医院工作。其实，赛珍珠所写的耶稣是凡人而不是神，故意弄出这个错误以泄对基督教会的不

满。郭生也未信教，只是换了一副慈悲心肠而已。小说强调的是“爱人”。

赛珍珠更善于以敏锐的眼光考察不同宗教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相互碰撞或相互冲突的，从而探讨不同信仰者如何通过“爱”进行沟通的问题。《牡丹》和《匿花》就是这一题材的小说。《牡丹》中，伊兹勒夫妇分别信仰儒教和犹太教，围绕儿子的婚姻问题，引起了一场家庭纠纷。太太严格遵照主的旨意，坚信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耶和华是人类唯一的上帝，她认为儿子大卫与中国姑娘桂兰恋爱便是亵渎了上帝，与异教徒联姻必将打破犹太民族的纯洁性。她还辞退了儿子的中国老先生，让犹太牧师拉比取而代之。然而，丈夫却支持儿子的亲事，并且鼓励他常去拜访中国老师。桂兰的父亲孔诚是伊兹勒公司的助理，与伊兹勒太太相比，他既善解人意又开明大度。面对前者的偏狭，他一直保持忍让谦和，希望伊兹勒太太能摈弃狭隘的民族心理，以慈悲为怀，仁爱为重。他说：“让我们的儿女成亲吧，让他们生儿育女，恨是要付出代价的，相比之下，爱的代价要低得多。”<sup>[7](P.116)</sup>另外的冲突发生在大卫的中国家庭教师、孔诚和拉比之间。拉比要求大卫牢记耶和华要将异教徒杀死、砸死的诅咒，而中国老师却谆谆告诫他：“君子以德报怨。”拉比坚信世上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耶和华，而孔诚却认为耶和华是上帝，穆罕默德信徒也信奉一个上帝，上帝不会有意把人分开，天下一家。伊兹勒去世后，孔诚特地请来和尚为他超度亡灵，遭到大卫反对，原因是父亲不信佛教。然而主持却回答他说：“令尊虽说是异族人，却有一颗宽阔的心。他从不把自己与他人分开，我们敬重他，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奉献给他的就是我们的宗教。”如果说，《牡丹》里的宗教冲突主要集中在犹太教和儒教之间，那么，《匿花》里既有基督教与佛教的冲突，也有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纷争。信奉佛教的沙凯医生的儿子凯山偏偏与基督徒的女儿相爱，导致了父子之间激烈的矛盾。信奉基督教的肯尼迪夫人之子艾伦在日本服军役时偏偏迷恋上了沙凯医生的女儿乔伊斯，信仰的分歧酿成了悲剧，最后这对不被承认的恋人只好离家出走，选择一个寺庙结了婚。沙凯医生不希望儿子在教堂举行婚礼，肯尼迪夫人则认为佛教并非真正的宗教，寺庙里到处竖满了神像，更是与教堂有天壤之别。赛珍珠将这种种冲突归因为爱的缺失。

完全从正面宣扬“天下一家”的宗教观和人道主义之爱的是小说《群芳亭》。安德雷与吴太太之间建立起了跨越国界、种族、宗教和身份的沟通，根源就在于安德雷与强调世界上只有一种宗教的夏小姐不同，他大胆地宣称，全人类的血液都是同一种物质，大家彼此都是亲骨肉。他告诉吴太太自己的传教之法“在面包和水里、在睡觉和走路之中”，在“打扫屋子和花园之中”，在“喂养弃婴之中”，在“陪坐病人和帮助弥留的人之中”。他说他的信仰“在宇宙、在虚空、在太阳、星星、云彩和风之中”，上帝“在我们的四周，他在空气里和水里，在生与死里，在人类之中。”安德雷身体力行，教导吴太太要用人道主义精神去对待他人，像爱自己一样地去爱别人。他批评她不该给丈夫纳妾，不该只想着自己的自由。安德雷虽然因为救助穷人而客死异乡，但他并不孤独。吴太太曾在心里告诉他，告诉他那在天上的灵魂：“可是我们不拒绝你，我们绝对不拒绝你！”安德雷这一角色身上浓缩了赛珍珠一生的人生体验，也浓缩了她的人生观。为自己的国人所拒绝的孤独感，渴望在异国通过自己的无私之爱而得到认同与归宿的愿望，坚决倡导宗教宽容和天下同一的决心，在这部小说中毕现无遗。

在阐释东西宗教文化冲突上，赛珍珠显然缺少深刻的理论的指导。关键是她所提倡的对话与互补的态度是颇具启发意义的。比如，她称赞东方文化中安于生活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智

慧，一种镇静精神，这实际上也是耶稣教诲他的门徒的话“不要想到明天”的主旨。东方智者则如此解说：忧虑没什么结果，我们“未知生焉知死”，何必讨论宗教上的废话。赛珍珠欣赏东方人坦白地将宗教与自己的生活隔开的态度，认为西方需要把“镇静”归化于所固有的宗教中。她甚至预言，“东方将把精神上的镇静和伦理上的情义这两大贡献‘重行灌输于一种真实的宗教中；而这种宗教将来也许为我们全民族所共信奉，其伟大性足以感化我们大家，使我们溶化于其无信条的精神中。”<sup>[8]</sup> 赛珍珠的理想的确具有乌托邦成分，但是，将其所持的态度与理论分别探讨，却是批评者的责任。

赛珍珠身处两个世界的特殊经历，给了她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背景，两种思维方式，两种民族感情，这使她摆脱了西方人惯有的种种偏见，既非欧洲中心主义者，又非华夏中心主义者。赛珍珠说自己是双料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所谓的国际主义者。她不相信将来各民族合并为一，不相信各民族的衣食住行、语言行为、政教礼乐都相同的乌托邦，也不相信将来的各个宗教、各个政党合并为一。如果这样，世界将变得异常单调贫乏。赛珍珠说：“国际主义，我所认为合意或实际的，只是那种对于我们的异点，能够互相了解，或是至少互相敬重，而对于我们这些异点的存在的权利加以保护。”<sup>[9]</sup> 她为异质文化双向认识提示了可行的策略。如何在文化的相对性与普遍性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以超越狭隘的种族中心观？那便是“寻异求和”，而不是“求同存异”（这是处理政治或外交问题的原则），在差异中求得和谐。与其存异，不如寻异和释异，以求互补。

#### 参考文献：

- [1] 乔纳森·斯潘塞. 改变中国 [M]. 北京：三联书店，1990.
- [2] 彼德·康. 赛珍珠传 [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 [3] 赛珍珠. 最后的倾诉 [J]. 当代外国文学，1996，(3): 68-76.
- [4] 赛珍珠. 我的中国世界 [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 [5] T.F.Harris. *Pearl S. Buck: A Biography*. Vol. II, London: Eyre Methuenltd, 1972.
- [6] 赛珍珠. 忠告尚未诞生的小说家 [J]. 世界文学：1卷5期，1935.
- [7] Buck, Pearl S. *Peony*. New York: John Day Co., 1948.
- [8] 赛珍珠. 东方精神 [J]. 西风：10期，1937.
- [9] 赛珍珠. 新爱国主义 [J]. 论语：27期，1933.

#### Pearls S. Buck's Views on Religion

XU 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Pluralistic views on religion exist simultaneously in Pearl S. Buck's system of ideas. Her novels show various situations when different religions collide and conflict. She advocates religious toleration and holds that these religions communicate by "love" and "humanism". An analysis of Buck's views on religion might open the lock deep in her heart. It can also maintain clearly the enlightenment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Pearl S. Buck; views on religion; religious toler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